

| 中华学人丛书



# 完整的天下经验

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

◎ 韦兵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华学人丛书

# 完整的天下经验

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

◎ 韦兵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 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完整的天下经验：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/韦兵著. —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5

(中华学人丛书)

ISBN 978-7-303-24139-2

I. ①完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—辽宋金元时代②中国历史—研究—西夏 IV. ①K24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92931 号

---

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-58805072 58807651  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 <http://xueda.bnup.com>

---

WANZHENG DE TIANXIA JINGYAN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[www.bnup.com](http://www.bnup.com)

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印 刷：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30 mm × 980 mm 1/16

印 张：12.75

字 数：210 千字

版 次：201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8.00 元

---

策划编辑：谭徐锋

责任编辑：赵媛媛 姚安峰

美术编辑：王齐云

装帧设计：王齐云

责任校对：李云虎

责任印制：马 洁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：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：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：010-58805079

# 目 录

绪论 完整的中国经验：多元一体的夷夏阴阳互动 .....	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## 时间 空间 历法

边疆形态、天下的时空传统及其现代转换 .....	21
一、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与游牧世界的弥散时间 .....	22
二、现代时空观念与国家边疆、主权观念 .....	29
结 语 .....	34
竞争与认同：从历日颁赐、历法之争看	
北宋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.....	35
一、历日颁赐：再认统治秩序的仪式 .....	37
二、历法之争：时间厘定中的天命竞争 .....	44
结 语 .....	47
多极朝贡体制下时空秩序厘定的争夺：	
以南宋、金历法正朔竞争为中心 .....	49
一、南宋初年天文历法知识的散失与重建 .....	50
二、南宋颁历与宋金交聘中的历法竞争 .....	57
结 语 .....	65
从圣节看 12 世纪东亚的民族竞争与多元体制：	
以天申节等为中心 .....	66

一、圣节中的宋、金民族竞争 .....	67
二、从两宋之际宋、金、夏、高丽贺圣节交聘看 东亚国际关系变化 .....	82

## 个人 地域 战争

### 宋夏战争中的个人选择与命运：

《李宗师墓志铭》与宋夏唃兀城之战 .....	93
一、以文换武 .....	94
二、唃兀之战 .....	96
结 语 .....	105

### 陇南过渡地带夷夏互动个案之一：

从《鼎勋堂记》看南宋嘉定年间陇蜀军政与人物 .....	110
一、安蕃：陇蜀军政中的财计官员 .....	111
二、张威：一名蜀口中级将领的沉浮 .....	117
三、程信：宋夏联合对金的巩州之役 .....	125
结 语 .....	129

### 陇南过渡地带夷夏互动个案之二：

元代汪古部礼店赵世延家族与文化考述 .....	135
一、“惟雍古氏，方叔召虎”：赵氏家族世系与人物 .....	136
二、“能令将种为书种”：赵氏家族的文武转型与 赵世延的儒学、艺术成就 .....	141
三、“赤松曾许同千载”：赵氏家族的道教信仰 .....	152
结 语 .....	162

### 《贺仁杰墓志铭》与钓鱼城约降、王立系狱事 ..... 172 |

一、户县出土的《贺仁杰墓志铭》 .....	172
二、约降 .....	174
三、受降 .....	177

四、系狱与平反 .....	180
结 语 .....	183
参考书目 .....	185
后 记 .....	195

## 绪论 完整的中国经验： 多元一体的夷夏阴阳互动

断裂与分化大概是文明发展的常态，连续的“广土众民”的中国，不符合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。中国何以会背离常态，能够成为连续的“广土众民”的中国呢？这一问题，我们姑且称之为“中国之谜”。我们从西方引入的一些现成概念和理论，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显得缺乏说服力。我们希望从本土经验中来寻求答案，寻求更有解释力的说法。我们认为中国连续性的“广土众民”，在很大程度上与天下观念的兼容性，以及实践中的“弹性”密切相关，这是一套独特的中国经验。<sup>①</sup>

古代中国从狭义上讲是指华夏世界，广义上是指包含夷夏二维的天下。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国，其疆域与族群和广义的中国联系更密切。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其广义，而不少关于古代中国的表述

---

<sup>①</sup>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[美]拉铁摩尔：《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》，唐晓峰译，南京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8；葛兆光：《宅兹中国：重建有关“中国”的历史论述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1；杜正胜：《中国古代社会多元性与一统化的激荡——特从政治与文化的交涉论》，载《新史学》，第11卷，第2期，2000；[日]渡边信一郎：《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——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》，徐冲译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8；姚大力：《谁来决定我们是谁——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》（上、中、下），载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，2011-03-20、2011-03-27、2011-04-03；王铭铭：《超越“新战国”：吴文藻、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》，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2。

中，中国与天下确实也是等同的。天下不是简单的“夷狄向慕，万国来朝”，这种以华夏为中心的表述确实是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层面，但不是唯一层面，天下观念具有丰富的维度和层次。这些层次中有些是观念层面的，有些是实践层面的，更多是介于二者之间的；同时，天下的维度里面不仅包含华夏的表达，也兼容“夷狄”维度的表达。这就是说，这种兼容表现从夷狄的角度看，天下同样被接受，同样有说服力，同样在实践中有效。不同维度、层次的表达与实践中的认同共同构成了关于天下的完整的中国经验。

从观念上讲，对于夷夏关系，中国人用自己的概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：夷夏如阴阳，“中国之有夷狄，如昼之有夜，阳之有阴”<sup>①</sup>。这是中国人独特的思维，这不是一种黑白分明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，阴阳的微妙之处是既对立又融合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共生共存，处于永恒的对峙与互动的运动中，也就是一种虚虚实实的“势”。阴阳永远不可能消灭其中一方，夷夏同样是这样，中国也是这种夷夏之间对立、互动、互融的“势”的产物。夷夏二维，缺少任何一方，都不能称其为中国。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从这种双向、动态的“势”去把握。对比西方，罗马人眼里文明与野蛮是黑白分明的对立，不是文明战胜野蛮，就是野蛮消灭文明，二者界限分明，刚性对立，没有中间状态。罗马人没有给蛮族留下生存空间，即使容忍蛮族的存在，也是因为确实暂时还没有力量消灭他们。同样，蛮族对罗马人也一样。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就是文明断裂，其结果就是所谓“黑暗时代”。

夷夏如阴阳，相互依存。即使从一向尊大的华夏角度，其实也曲折地认同“夷狄”一维的存在合法性，“夷狄自有盛衰，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”<sup>②</sup>，此所谓“夷情”叛服不常，不系中国之盛衰。在这

① (宋)范祖禹：《唐鉴》卷三，80页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。

② (宋)晁说之：《元符三年应诏封事》，见《嵩山文集》卷一，四部丛刊续编本。

种表述中，夷狄是另一个系统，他们有自己的天命，自有兴衰规律，和华夏盛衰关系不大。这虽然主要是为王朝边患开脱，认为其无损盛世。但夷人自有法度、夷狄自有兴衰，这样的表述本身就隐含了夷夏二元甚至多元并存，以及夷狄那一套道理的合法性，承认他们自成系统。这种观念和王朝盛世必须声教远被，四夷宾服的“强表达”已经有不同。华夏世界有一套关于天下四夷的“弱表达”，在这种表达中，四夷这一维的主体性无意间被关注：曾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，见朝廷欲灭交趾，他认为，“交人虽海隅尺寸之地，然有国百年，兴衰存亡，必亦自有天数，岂人力所能必？”<sup>①</sup>曾布是想说明交趾这样的小国存亡自有其规律，不是朝廷一厢情愿就可以实现征服的，更何况西夏这样的强敌。宋初张知白就曾说：“夫戎狄者，亦天地之一气耳。”<sup>②</sup>元符二年（1099），章粦也在讨论对西夏边防时说，“臣闻夷狄，天之一气，从古无灭绝之理”，所以“使中国形势常强，四夷不敢侵侮，乃是治安之策”，而不在于出兵深入。<sup>③</sup>宋朝士大夫一般承认夷狄一维的合法性，能够理解夷狄自有其天命的道理，他们更熟悉这种“弱表达”。所以，用阴阳来比喻夷夏关系最贴切，古人虽认为阴不好，但也知道阴阳相依而成，阳永远不可能消除阴，就如夷狄是天之一气，没有灭绝的道理。从汉到宋，这种观念基本是儒家的共识，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，然其欲避害就利，爱亲戚，畏死亡，一也”<sup>④</sup>，“蛮夷之俗不知礼法，与中国诚不同；若其恋父母骨肉，保惜山林、土田、资产，爱生而懼死，

①（宋）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一七，元符二年十月丙辰条，第34册，12301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9—1993。以下简称《长编》。

②（宋）张知白：《上真宗论时政》，见（宋）赵汝愚：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一四六，1657页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。

③《长编》卷五〇五，元符二年春正月丁巳条，第34册，12036页。

④（汉）班固：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卷六九，第9册，2987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。

其情一”<sup>①</sup>，边患多为边吏不法侵扰、邀功生事导致的事端。夷夏之间风俗有异而人情相同，“华夷万里，异生不异情”<sup>②</sup>，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夷夏之间的相通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夷夏放在了相对平等的位置。

其实通观历史，除极少数“多欲”的帝王，在具体政治实践中，“弱表达”才是华夏天下世界的主流。唐代史臣在评论隋炀帝发动的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时批评他：“狭殷、周之制度，尚秦、汉之规摹”，是“思逞无厌之欲”。<sup>③</sup>“殷、周之制度”与“秦、汉之规摹”之别，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说关于天下的“弱表达”与“强表达”。宋人对此义理探讨得很深入，批评开疆拓土的“秦、汉之规摹”——“秦皇汉武只为与外域角力，以致中国疲敝，春秋之待夷狄自有道，不徒以力也”<sup>④</sup>。范祖禹讲得更明白，“彼虽夷狄，亦犹中国之民也，趋利避害，欲生恶死，岂有异于人乎……山川之所限，风气之所移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，得其地不可居，得其民不可使也，列为州县，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”，他批评唐太宗，“太宗矜其功能，好大无穷，华夷中外欲其为一，非所以遗后嗣，安中国之道”。<sup>⑤</sup>“秦汉规摹”强烈的征服欲望是被儒家主流价值观所批判的，是“多欲”的表现。征服与占领的强势表达从来不是天下观念的主流价值，天下的一统更注重华夏世界在象征意义上的正朔、朝贡的实现，而非攻城略地、子女玉帛，这才是阴阳相安的待夷之道。这样，“务安诸

① 《长编》卷四八二，元祐八年三月庚寅条，第32册，11469页。

② （宋）员兴宗：《恤归附劄子》，见《九华集》卷五，收入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56册，215页，北京，线装书局，2004。

③ （唐）魏徵、令狐德棻：《隋书·炀帝纪下》卷四，第1册，95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3。

④ （宋）家铉翁：《春秋集传详说》卷一八，见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58册，337页，台北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。

⑤ （宋）范祖禹：《唐鉴》卷三，80~81页。

夏，不事要荒。……不以四夷劳中国，不以无用害有用”<sup>①</sup>成为对外关系主导政策。即使好大喜功的隋炀帝，当突厥启民可汗上书要求“依大国服饰法用，一同华夏”的华化要求时，也委婉拒绝，“衣服不同，既辨要荒之叙，庶类区别，弥见天地之情”，认为夷夏之别是天地固有之情势，不必强同。<sup>②</sup> 隋炀帝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选择“强表达”。从舞干戚以服化夷狄的积极进取的“强表达”，到不以夷狄累中华的相对隔绝的“弱表达”，华夏世界的天下里面，夷夏进退的掌控有一个宽泛的度可供选择，这种弹性对中国影响深远，华夏世界可以根据国力情势选用，回旋空间很大。

中国人讲夷夏之辨、夷夏之防，古人使用“辨”与“防”的说法，措辞下得谨慎而准确，强调的是消极性的“区分”，而不是积极性的“消灭”，是在描述一种双方动态的“势”，它更突出双向性，更强调变化。除了夷狄进而为华夏、华夏退而为夷狄的变化外，对于夷狄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宋人在官方交往中称契丹为“大辽”，而内部行文则称之为“敌国”，“敌”除了敌人、敌对的意思外，还有相敌、对等的意思。对契丹有相当了解的韩琦、富弼等有外交实践的官员都认为，古今夷狄不同，契丹、党项“得中国土地，役中国人力，称中国位号，仿中国官属，任中国贤才，读中国书籍，用中国车服，行中国法令，是二敌所为，皆与中国等。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，中国所有，彼尽得之，彼之所长，中国不及。当以中国劲敌待之，庶几可御，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？”<sup>③</sup> 凡中国所有，尽皆得之，而且其所擅长还是中国所不具有的，这样的夷狄还是不是夷狄呢？宋人感觉到处于他们时代的“北朝”和经典里面记载的夷狄

① (唐)魏徵、令狐德棻：《隋书·西域传》卷八三，第6册，1860页。

② (唐)魏徵、令狐德棻：《隋书·突厥传》卷八四，第6册，1874页。

③ 《长编》卷一五〇，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，第11册，3641页。宋人对契丹的看法可参考陶晋生：《宋辽关系史研究》，83~105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8。

不一样了，这 and 现代学者对第二个千年北方游牧政权的判断是一样的。作为理性的政治家，富弼对契丹人“北朝”的评论意味深长，一方面肯定要维护大宋对中国的专享，但也不得不看到辽国客观具有的中国特性，所以称之为“中国劲敌”，既保留大宋名分，也顾及契丹的现实，这是宋人在正名上的苦心。大中祥符元年(1008)六月，宋国通报契丹将举行封禅大典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以下简称《长编》)载契丹报书：“中国自行大礼，何劳告谕？其礼物虑违誓文，不敢辄受”<sup>①</sup>，据此似乎契丹称宋为中国，但《宋会要》保留更原始的记录，第一句是“封禅大礼”，并没有称宋为中国，《长编》所据已经是经过宋人“润色”的契丹报书，是为了强调名分上中国称号归属于宋，所以改写了报书文字。其他传世文献中契丹等称宋为中国的情况，有些就类似于此，是出于宋人的润色。皇帝为中国天子的专称，而宋、辽两国国书互称对方君主为皇帝，这表明宋辽双方都默认当时天下有两个天子。

在华夏书面经典的层面上，天下的表述有时候趋向“强表达”，但在实践中，天下观显示了充分的弹性，兼容了夷夏世界不同族群丰富的诉求。了解天下观念的丰富层次，实践中的兼容，回到历史的具体场景中比只看儒家学者的表述有用。毕竟，中国人说与做的张力是成熟的研究者必须警惕的。比如，从“夷狄”的角度，难道也是坦然接受这种以华夏为中心的表述，毫无疑问地被动接受向慕、来朝的说法吗？恐怕未见得。夷狄也有他们自己对天下的看法，只是夷狄在天下的表达方面很多情况下是失语的，他们关于天下的表达往往被忽略。

天下秩序中隐含了一种理解，就是“有德者居之”，这个观念突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长编》卷六九，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甲午条，第6册，1548页。另参见(清)徐松辑：《宋会要辑稿》蕃夷二之二，第8册，7693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7。

破了现实中地域和种族的局限。北方民族政权同样可以认为占有中原、征服广大地域本身就是一种受命于天的“德”，抛开正统观念的偏见，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族群都曾具有或自认为具有此德，因而受命于天，入主中国。这也就是说，天下共主是一种“虚位”。唯有虚位才最具包容性，它给每一个角逐在东亚历史舞台上的族群预留入主的权利和可能性，历史上众多族群愿意竞争这一虚位，有进有退，这将众多的族群绾合在一起。回过头来看，兼容“多”能维持“一”的向心力，形成连续的广土众民的中国，天下的“虚位”非常重要。

契丹人就认为自己直承汉唐谱系，“尽致周、秦、两汉、隋、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”<sup>①</sup>，自豪地宣称“一统正朔，六合臣妾”<sup>②</sup>，这就是天下共主的姿态。金人灭辽、北宋，号称是因为“契丹国主失道，民坠涂炭”<sup>③</sup>，“(宋)天厌其恶，民不聊生”<sup>④</sup>，所以金以“吊民伐罪”的名义用兵，承天命、以有道伐无道是共主的职责。虽然不能说金人一开始就有经略天下的宏图，这些书诏也不一定是金人自己写的，可能出自治下的汉人或契丹人，但这一点在金国建立后日益强化，他们自认天命所钟，自称中国正统，尊奉儒家学说。蒙古统治者在诏书里宣称“长生天气力哩，大福荫助佑哩”，前一句相当于“奉天”，后一句相当于“承运”，这两句话就是翻译汉语“奉天

① (元)脱脱：《辽史·仪卫志一》卷五五，第2册，899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4。

② (辽)耶律俨：《道宗皇帝哀册》，见阎凤梧主编：《全辽金文》，574页，太原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2。

③ (宋)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五，108页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④ (宋)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八四，630页。关于辽、金的中国观可参考刘浦江：《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正统性问题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2004(2)；赵永春：《试论金人的“中国观”》，载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，2009(4)；赵永春：《试论辽人的“中国观”》，载《文史哲》，2010(3)。

承运”，也是承天命德运以君临四海的意思。<sup>①</sup>元代四等民，换一个角度看，其实是以蒙古民族为中心的另一个版本的五服。而万国来朝也远比我们以为的复杂，其往往不是朝一个中心，而是朝两个或以上的中心，高昌两事隋与突厥，回鹘同时向宋、辽进贡，高丽依违于宋、辽之间。中原王朝的记录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性，似乎有意无意回避多中心。多中心并不代表天下体系的崩溃，天下是分而不崩。10—13世纪宋、辽、夏、金、蒙古都是当时亚洲的相互竞争的中心之一，这是“分”；但各中心至少在基本观念层面都认为天下中心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己，而且深信自己可以归并其他中心，完成天下的重新统一，这是“不崩”。

天下的“弹性”兼容多维度、多层面的表达和实践，既包括把众多族群综合在一起的“一”，也有保留相对独立的“多”，提供给夷夏互动极其宽裕的回旋余地。华夏表述中夷狄如禽兽的说法，不过是一种修辞，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感，真正政治实践中似乎并未把夷狄作为禽兽，这还是一套因其俗而治其民的手段。夷狄同样有他们的“修辞”，西夏语称汉人音为“杂”，对应的西夏字由“小”和“虫”两个西夏字组成。<sup>②</sup>蒙古人把南宋人称为“蛮子”。我们熟悉许多夏对夷的歧视性称呼，这算是一种夷对夏的歧视性称呼。但在具体治理中，辽、金、蒙古帝国也有一套因其俗而治理汉人的方法。

我们讲到天下，往往注重静态、单维的“九州”“五服”，这只是天下的标准型，而实践中的天下往往是动态、多维的非标准型。至少，夷狄如何表达他们眼中的天下，华与夷如何在具体实践中“操作”天下，以达成默契，这两个方面非常重要。尤其是夷狄这一维如何体现自身主体性，并影响华夏一维的行为常被忽略，我们探索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点蒙聂鸿音先生提示，参见《回归考据学：21世纪西夏文献研究新动向》（成都，四川大学名师讲堂，2012-11-21），特致谢。

<sup>②</sup> 史金波：《西夏社会》，38页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。

关于天下经验的完整描述，这些方面亟待纳入考察视野。

我们把眼光聚焦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，可能比通常的宏观概括更能看出问题。面对多元中心，夷夏双方都有一套实践智慧来处理相互关系，这里面有各种协调矛盾的“说法”，也有交往中的相互观察、揣摩、调适的“做法”。这些都是为达成多中心间的交往而不是相反。在战争和臣服两极间，有很多中间道路可供夷夏选择，比如，羁縻或和亲。元昊对宋国书称“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”，对宋帝称父不称臣，其中深意是父子之间，情同一体，但子不同于臣，其独立性是可以保障的，这有利于争取与宋平等外交。<sup>①</sup>元昊对宋的国书本来要直接称皇帝，通过协商改称“兀卒”，又作“吾祖”“乌珠”，意思是“青天子”，而中原皇帝是“黄天子”。北方游牧民族敬天，认为天色青，元昊称“青天子”是特示尊贵，其实还是称帝。其他西夏官职宁令（太尉）、领卢（枢密使）双方也约定只用音译。<sup>②</sup>宋不愿看到一个鼎立称尊的西夏，对这些西夏国书“僭越”的称呼，宋和西夏约定，只能音译，否则不接受。音译至少字面上没有僭越，至于字音后面什么意思，可以假装不知，算是面子上勉强敷衍得过去。其实，宋朝君臣都知道这些音译夷语的意思。元与吐蕃（今西藏自治区）之间，元朝中央对其进行实际的行政管理，但在说法上有讲究，西藏的教史认为，“蒙古和萨迦派结为施主与福田的关系，吐蕃地方纳入了忽必烈皇帝的统治之下”，这种

<sup>①</sup> 吴天墀：《西夏称“邦泥定”即“白上国”新解》，见《吴天墀文史存稿》，281页，成都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8。

<sup>②</sup> 吴天墀：《西夏称“邦泥定”即“白上国”新解》，见《吴天墀文史存稿》，281、287页。宋朝对外邦进呈表章先翻译，再改写、润色的情况，可参考黄纯艳：《“藩服自有格式”：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，2008（8）。

“施主与福田”的说法双方都认可。<sup>①</sup>

不同族群要建立稳定的交往，必须相互了解，也就是要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，这样相互间的行动才会被对方理解。这就要求务知其俗，夷夏双方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从许多交往的细节可以看出，夷夏的交往中，既有相互之间对对方不合实际的臆想、揣度，也有通过了解，因其俗而制定合理的政策。在这方面，宋朝就一点也不颀顽，在决策中对作为他者的夷狄一维颇为关注。富弼观察到契丹人“风俗贵亲，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，所以视中国用人亦如己国”<sup>②</sup>。所以在契丹人的想象中，宋朝宗室“八大王”的燕王最厉害，“朝廷庶事，皆决于王。王善用兵，天下兵皆王主之，严刑好杀”，小儿夜哭，就恐吓说“八大王来也”，牛马不下水渡河也说，“必是八大王在河里”，出使宋朝的契丹使节也每要问及八大王安否。<sup>③</sup>“八大王”殆指太宗子周恭王元俨，于兄弟中行八，故有此称。元俨历事三朝，位望崇隆，契丹人认为他是宋朝最有权势的人。这其实完全出于契丹人从北方游牧民族崇尚贵戚、宗王握实权的政治制度而对宋的臆想，宋朝宗室包括元俨在内基本没什么实际权力。富弼认为可以利用契丹人尚贵戚的观念，稍复宗室，以期震慑契丹。有趣的是宋人对契丹也同样存有臆想，宋人听说的契丹南大王、北大王、鲁王、楚王，以为都是了不起的良将，富弼接触后认为未必名副其实。<sup>④</sup>熙宁五年（1072），在讨论王韶带何职名时，文彦博认为：“边人不知职名高下，但见呼龙图即以为尊”<sup>⑤</sup>，建议授予直龙

①（明）达仓宗巴·班觉桑布：《汉藏史集——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》，陈庆英译，203页，拉萨，西藏人民出版社，1986。

② 罗继祖：《八大王元俨》，见《枫窗三录》卷二，190页，大连，大连出版社，2000。

③ 《长编》卷一五〇，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，第11册，3644页。

④ 《长编》卷一五〇，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，第11册，3644~3647页。

⑤ 《长编》卷二三五，熙宁五年七月丙午条，第17册，5719页。

图职名，以震慑边人。其实直龙图阁并非很高的职名，边帅多带龙图阁、直龙图阁的职名，就是出于这种边人尊奉龙图的考虑。西夏人对龙图阁直学士知延州赵高表示“我不敢犯龙图”<sup>①</sup>，也是这种风俗。

这些策略的制定都顾及了夷狄一维，通其情，知其俗。又如异族文字，表面上宋人对其颇为歧视，但在具体实践中，边境上对敌宣传也刻印蕃汉双语文字，西夏方面也有蕃汉对照的双语词典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，以备日常交往中使用。宋朝的大臣，如余靖，“前后三使契丹，益习外国语，尝对契丹主为蕃语诗”<sup>②</sup>。夷夏双方在行动中都试图理解对方一维的视角，无数这样的细节就构成了如阴阳互动的夷夏之势。夷夏双方在这一过程中都要换位，和谐的交往才能达成。双方的说法与做法在实践中都需要一系列“技术处理”实现默契。夷夏之间的“势”就在这种双方频繁交流中确立，夷夏内外、进退的“度”也在这个过程中确立。这些实践智慧不能完全避免冲突和伤害，但为默契、缓和与修复创造了最大可能。

宋、辽、西夏边境的严格管制也没能阻止信仰的交流，宋朝的信众不顾边禁，越境到辽国律寺受戒<sup>③</sup>；辽国的僧人越境远赴西夏河西访师参问<sup>④</sup>。五台山在唐宋时代成为整个亚洲著名的佛教中心，天竺、西域、吐蕃等族信众均视之为圣地，不远万里前去参拜。五台山在宋朝境内，元昊曾多次请求前往瞻礼，由于宋夏交

① 《长编》卷四〇九，元祐三年四月壬午条，第28册，9966页。

② 《长编》卷一五五，庆历五年四月戊辰条，第12册，3772页。关于余靖出使时使用蕃语的问题，参见曹家齐：《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考议——兼说北宋仁宗朝廷对契丹之态度》，见《宋代的交通与政治》，301~322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17。

③ （辽）段温恭：《特建葬舍利幢记》，见阎凤梧主编：《全辽金文》，412页。

④ （辽）棋峰虚缘老人：《登州福山县侧立普安院希公戒师灵塔》，见阎凤梧主编：《全辽金文》，524页。